夏衍的话剧《上海屋檐下》，显现出他平淡朴实、自然深远的艺术风格。作者截取的是上海某弄堂房子五户小人物一天生活的横断面。通过“这些小人物的苦闷、悲伤和希望，反映历史的黄梅季节，传递出“将要到来的时代的脚步声音。”(《夏衍：《谈上海屋檐下的创作》)对于这部剧作，夏衍曾说：“这是我写的第四个剧本，但也可以说是我写的第一个剧本，因为在这个剧本中我开始了现实主义创作手法的摸索。”正如他所说，《上海屋檐下》的确是他的现实主义创作的起点。  
 小人物生活在社会的底层，各有各的不幸和苦楚。报贩李陵碑因独子捐躯沙场，晚境异常凄凉，只能酗酒解闷，孤吟消愁；耿直的知识分子黄家楣，失业居家，恰逢老父远道来视，不免悲喜交集。为博取培育自己的父亲的欢心，不惜典衣当物，借债度日；海员之妻施小宝，更是无依无援，为流氓小天津挟持，被迫沉沦堕落；相比之下，小学教员赵振宇和工厂职员林志成的生活稍有着落，但赵妻在生活煎迫下，时有衣食住行的愁虑，林志成也要担心饭碗是否牢靠。他们在抗战到来之前，都过着苟且麻木、忧郁悲伤的生活。沉重的黑暗缩短了他们的目光，扭曲了他们的性格。他们在咀嚼自已不幸的同时，往往向更弱者转嫁自己的不幸。赵振宇夫妇在卖菜者处获得若干小便宜，竟“露出微笑”。林志成、黄家楣不堪忍受社会的折磨，妻子就成了发泄自己苦痛的对象。狭隘的感情摩擦和人事纠纷，弥漫着庸俗、灰色的小市民气息。  
 夏衍现实主义的深刻性在于，既嘲讽小人物思想性格的弱点，——但仅是含泪的微讽，——又清醒地看到，小人物的种种不幸和畸形社会的黑暗投影。  
 他把艺术的锋芒指向病态的社会。对小人物的善良正直本性，从来是肯定的。且勿论林志成处于亦“牛”亦“狗”的境况中，内心是多么痛苦，一旦“从一方面受人欺负，一方面又得欺负人的那种生活里面解放出来”，又有多少兴奋。即如有与世无争、自得其乐的消极思想，为比上不足、比下有余的无味生活而意足的赵振宇，也终究不能无视李陵碑的被人欺辱。小人物内心的善与社会的恶的冲突，与自身卑琐思想的矛盾，如同一股股潜流，在奔涌激荡。我们毫不怀疑，这是催他们觉醒的萌芽。因而，他们不甘久安平庸的生活，在怨愤、挣扎之中，就包含着对历史的黄梅季节的厌倦，对新的生活的一丝向往。  
 早在二十年代初，在小说《故乡》里，鲁迅就借“我”的口道出自己对劳苦大众的深厚祝愿：“他们应该有新的生活，为我们所未经生活过的。”夏衍承继了鲁迅的战斗传统，不仅悲小人物之悲，更努力增添亮色，塑造出新的人物形象，那就是革命知识分子匡复和葆珍、阿牛几个孩子。如果说，在剧本中，小人物不是新的生活的开拓者，那么，这些新的人物就犹如“灿然的阳光”，射进了浸透霉气的可诅咒的生活。有了他们，小人物摆脱苦难生活是可能而且必然的。  
 戏剧的主线是林志成、杨彩玉以及刚从监狱中出来的匡复三个人的感情纠葛。革命者匡复入狱,把妻子女儿托付好友林志成照顾,林在与杨长期接触中产生了感情,组成了家庭,而匡复的归来,使他们三人都陷入了尴尬的境地。作者无意把任何一个塑造成恶人,而是强调现实环境对人的折磨。林志成具有同情心和正义感,为了与朋友之妻组织家庭而过着自己不情愿的“一方面受人欺负,一方面又得欺负人”的生活,并备受良心的谴责。杨彩玉曾经是一个热情的,为了恋爱和革命而离家出走的少女,生活的磨难使她变成了劳碌、庸俗、苟安的家庭主妇。而在监狱八年受尽磨难,渴望从妻子、女儿那里寻找爱抚的匡复,面临的是妻子与好友同居的残酷现实。他们身上都带着过去留下的创伤,但新的力量也在阴郁的环境中显示出强大的生命力。匡复的归来使杨彩玉重新回忆起火热的青年时代,消沉的心焕发新的活力；女儿欢快的歌声使匡复重新恢复战士的激情,他毅然重新出走，割断缠绕自身的绵绵情丝，是为了告别沮丧的婚姻。在主线一侧，穿插了教书匠赵振宇夫妇一家、农村娃黄家楣一家、妓女施小宝和流氓小天津、兵哥父亲李陵碑等等，一副上海生活画面层层展开。志成，是弱者里面的一个! 剧中你，我，他，都是弱者!  
 戏剧结尾葆珍与阿牛领着大家唱“我们都是勇敢的小娃娃,大家联合起来救国家！救国家！”号召人们不怕“碰钉子”，不做忍辱负重“没有的大傻瓜”，而应“大家联合起来救国家”，具有促人振作、给人希望和信心的作用。这声音也压倒了李陵碑悲哀的曲调,激发人们从压抑、沉闷的氛围中走出来的决心。   
 《上海屋檐下》在戏剧结构上颇有特点,通过主副线的形式将五户人家的家事,五股相互交错的生活之流错落有致地展现在舞台上,充分体现了生活的丰富性和复杂性,每一个家庭中独特的生活旋律,共同构成了一个曲折多变、内涵丰富的乐章,体现了特定时代普通人的生存境遇,具有较大的涵盖面。诚然，作者寄托希望的人物，也有若干缺点或不足。  
 夏衍对剧中的人物、事件不作任何情感表示，不对它们指手划脚，而是将一切客观地展示出来，将裁判的权利交给观众和读者，让他们来评判。剧本似乎只透着剧中人物的悲喜欢忧：杨彩玉的无奈两难，李陵碑的变态潦倒，施小宝的求援无望，林志成的烦闷和惭愧等等。作者的感情似乎丝毫都没有介入，其实并非如此，实质上，作者渗透在剧中的情感是炽热而强烈的。作者始终怀着强烈的爱憎之情，细致深刻地体会着生活，以异常冷静的态度来对待这一切。这样剧本显得更加真实，没有呐喊与高呼，没有呼天喊地的哭诉，整个舞台气氛是非常平淡的，但这种淡又并非是淡而无味的，读者与观众都明白：那样的生活与黑暗、反动的统治是分不开的。  
 “淡化的情节”是《上海屋檐下》的现实主义表现手法的另一表现。普通市民生活这一题材类型决定了这一点。普通市民的生活并不是险象环生，充满着种种激烈的矛盾的。它更多的是平平淡淡，寻寻常常。非常平淡而又普通的一天生活能发生什么轰轰烈烈的事情呢？因而剧作家并不追求情节的紧张，而是多方处理，缓和剧中即将出现的戏剧种种冲突。如林志成、匡复、杨彩玉三人的情感纠葛，如在其他剧作家的笔下，很有可能被处理成浓烈的戏剧冲突。但在夏衍笔下，这一戏剧冲突被冲淡了，淡得出乎意料。作者有意避开浓烈的场面，使匡复、杨彩玉、林志成三人不出现在同一舞台空间。匡复找到林家时，杨彩玉出去买菜了；杨彩玉回来了，林志成却又被拉到工厂去了。当三人再次见面时，观众关注的焦点又转移到了林志成的工厂里究竟发生了什么事情，从而冲淡了三人之间复杂的关系。不仅仅在林、匡、杨三人的身上，在其他人物形象，如施小宝与赵妻及小天津之间等等都采取淡化戏剧冲突的方法，突破了传统戏剧情节高度集中的限制。作者意在通过对这些小人物的悲惨生活的展示，淡化戏剧冲突，调和生活矛盾，用舞台形象来引导人们透过生活的表层，去把握生活的本质，自然地流露出对生活的思考：人不能这样活着！  
 作者以独特的现实主义手法，淡化戏剧冲突，以异常冷静的态度，客观而不动声色地描写了小人物的普通生活，展示了小人物的性格、心灵和悲惨命运。  
 夏衍说他写戏“主要是为了宣传和在那种政治环境下表达一点自己对政治的看法”。直到写《上海屋檐下》之前才“认识到戏要感染人……必须写人物、性格、环境……”,所以作者说是从《上海屋檐下》才“开始了现实主义创作方法的摸索”,因而把它称为“第一个剧本”。

上海屋檐下》 是著名戏剧家夏衍1937年根据组名演员赵丹的个人情感经历而创作的三幕剧。在初次排演时，安排了夏衍称“几乎奢侈的演员阵容”，赵丹亲自扮演匡复，赵慧深扮演杨彩玉。后因战争延后，由怒吼社1939年在重庆首演。  
《上海屋檐下》除了主角匡复的三角恋之外，还刻画了失业的大学生、沉沦的女性、穷困的小学教员、失子的老报贩一系列背景迥异、性格鲜明的人物形象。  
《上海屋檐下》是夏衍戏剧现实主义特色的集中体现，代表了夏衍戏剧创作的成熟，体现了夏衍戏剧深沉、凝重、清馨、淡远的个人艺术风格。在中国现代戏剧史上占有重要地位。  
          
          
          
我将从以下四个方面来解读这部作品：  
一、题材和主题  
在题材的选择和处理上，夏衍没有一味追求传统戏剧所重视的故事的传奇性和情节的戏剧性，而是立足于现实生活，着眼于平凡的小人物和他们几乎没有色彩的生活。这种没有色彩的生活，本身就是一种颇为有趣的戏剧基础。回归人性本位，着重揭示人物的内心世界和他们畸形关系的悲剧实质。  
有人认为，这出戏剧没有高潮，过于平淡，我认为这种指责是出于对生活的理解不够透彻，对人物内心的挣扎没有体会的肤浅。这出戏剧不但精彩出众，而且严格按照传统戏剧三一律的古典原则撰写。整出戏剧发生在同一时间（梅雨季节的一日间）、同一地点（上海一家弄堂房子的一个横断面），外来者（匡复、黄父）对小人物沉闷生活的介入，打破了生活的沉寂，形成戏剧高潮。  
  
二、布局和结构  
《上海屋檐下》依据上海小市民“各自为政”的生活方式的特点，让五组人物沿着各自的生活逻辑，延伸、发展着自己的情节线。正可谓“人多戏不散，线多戏不乱”。在这些情节线之间，没有传统意义上纠结在一起的冲突，没有牵一发而动全身的连锁效应。但是这绝不是意味着《上海屋檐下》的格局是割裂的、分离的。恰恰相反，夏衍巧妙地利用了拥挤的弄堂房子格局，使这五户人家虽毫无关系又互相关注。在情节进行中的相互交错、穿插，做到了有机的陪衬和补充，使每条生活细流同在一个旋律和节奏中起伏、流动。在这拥挤的小空间中，每个人都在观察着别人，也成为被别人观察的对象。每个人都拙劣的隐藏着人性的暗色，而这笨拙的掩饰，只能使人物本身更具有戏剧性，更体现出人性和个性。  
三幕所发生的故事，以开端（建制）、高潮（冲突）、结尾（结局）的制式展开，循序渐进，发人深省。  
          
三、人物与环境  
在《上海屋檐下》中，人物和环境是相依相存的。不论是黄梅天的“阴晴不定”，还是屋檐下的拥挤、窒息，都不是简单的“背景”。可以说，这天气和环境不仅是剧中重要的意象，也成为了一个重要的戏剧人物。  
作品有意识地用阴晴不定，沉闷压抑的黄梅天气，影射当时的政治环境，反映了小人物在动荡不安的处境中的苦闷、悲伤和希望。剧情从郁闷烦躁的黄梅天开始，至传来“轰轰然的远雷之声”结束，其间烦人的雨声出现30多次，蕴含着“天色黑暗到了一定程度，一定要落雨，雨下到一定程度，一定要天晴”的政治寓意。在情节的开展中，又多次出现灿然阳光的“一亮”、“一闪”，隐约地表达了剧作者理想的光芒，留下了一条“光明的尾巴。”  
  
  
四、舞台表现  
夏衍在戏剧创作时，创造性的选用了一户上海弄堂房子的横断面作为舞台布景。话剧和影视剧的区别之一在于，话剧无法通过镜头和景别引导观众的视线，吸引观众的注意力。观众是自主的，有很大的选择权，有很强的判断力，只有通过舞台上正在发生的事件，正在说话的人，才能将观众的注意力吸引过去，吸引进冲突和主线中。因此这样的舞台布景，能够清晰的表现五户人家各自的生活，又同时能通过戏剧情节将观众吸引向冲突中心。  
为了突破空间的限制，夏衍亦将电影的剪辑手法运用于戏剧艺术，舞台蒙太奇的运用将许多平行发展的情节交织穿插，场面转换灵活，描写出复杂丰富的生活内容。  
另外，五户人家各自的迥异性格，不同的生活方式，又使得戏剧舞台并不单调沉闷，演员不断通过走位、台词来充实舞台内容，活泼戏剧气氛。通过这样的方式，五户人家的生活也因此戚戚相关，互相关联，同时也达到了更加深刻的刻画每个人物的目的。（如匡复出现后，和杨彩玉、林志成在屋内对峙，而此时屋外刻薄八卦的赵妻正在偷听，就很好的贯穿了屋里屋外两个空间，联系了两条生活线，观众通过屋子横断面的独特布局，享受到上帝的万能视角。）  
          
          
          
          
总之，《上海屋檐下》是一部精彩的现实主义戏剧作品，是夏衍作为戏剧大师当之无愧的杰作。70年来经久不衰的戏剧生命力和商业成功表明，它不仅体现了当时的时代背景，更超越了时间空间的限制，通过对小人物的真实刻画、对人性的细心揣摩，为中国戏剧史写下浓墨重彩的一笔。

分析现实主义戏剧《上海屋檐下》

契诃夫说过这样一段话：在现实生活中人们毕竟不是每分钟都在决斗、上吊或求爱，不是每时每刻都妙语横生。他们更多的是吃饭、喝酒、闲逛、说蠢话。这些应该在舞台上表现出来。剧本应该写成这样：人们来来去去，吃饭，玩牌，谈论天气。这倒不是应为作者希望写成这样，而是因为在真实的生活中人们就是这么生活的。

现实主义戏剧更倾向于真实存在性，它有着特定的文化背景，它的故事情节不像一般的舞台剧那样妙趣横生，没有过于激烈的矛盾冲突，一切看似平淡无奇，却在每一个平凡叙事的背后都能找到挖人深思、寻觅震撼心灵的闪光点，在现实主义戏剧中，反而故事越普通一般，越具有典型性。

《上海屋檐下》是夏衍现实主义创作的第一个剧本，也是中国话剧在现实主义道路上探索的一个突破。这部话剧是典型的把小人物和大背景的展现，以此构成鲜明强烈的对比，营造出一个真实的环境，真实的人物，以及真实的故事，让人信服。作者力图用一部分生活在底层，不同类型的人物，以及他们各自的生活和命运，反映一个悲苦的时代下，老百姓民不聊生的惨状，借以小人物之言行来表达自身的愿望，唤起读者的共鸣，传达一个民心所向的时代步伐。

正如题目一样，整个大情境规定在上海屋檐下，这幢老房子里有五户人家，全部都是生活在底层的人，不是小职员就是失业的，生活的很艰辛，作者把每个人物延伸到各个领域，透过每一个细节感受一群惶惶不可终日的人。黄梅时节让人透不过气的规定环境注定了这屋檐下的人要经历一番坎坷的曲折命运，这座弄堂房子也恰到好处的发挥了它的作用，遭受一种的压抑气氛，每个人的世界里都有挥之不去的愁云。由此可见，环境造就人，这里的人也没有什么追求，妇女交头接耳，只会抱怨，男人胸无大志，盲目的奔波最后毫无结果，甚至连这里的小孩也只知道吃，毫无人生价值观。还有为了生活不得不出卖身体的女人施小宝，在那个年代，她的行为必须承受别人异样的目光，无论她是否还心存一片阳光，无论她怎样去讨好那些难缠的妇女，结果还要遭受排斥，在别人眼里她是下流无耻的女人。然而当她衣衫凌乱爬在床上嚎啕大哭的那一刻，让人看出她原本和她们一样的坚贞善良，也许她也恨自己无情的践踏着无辜的灵魂，在这样的社会背景下，为了生存，她无法为丈夫守身如玉，只恨没有人理解她内心承受的煎熬。 整个剧本特定的时间是一九三七年，民国时期，正如剧本中所传达的那样民不聊生、动荡不定，每个家庭都应该得到幸福，可是贫贱夫妻百事哀，生活带来的诸多不如意直接给家庭造成反面影响，例如为柴米油盐之类的小事儿就会争执不休，女人罗嗦，男人不争气，造成家庭气氛也如同黄梅时节的天气一样沉闷压抑。同时更真实的映射那年代下层人民的生活状态。

剧中黄家楣即使费尽周折来到上海上学，也是家乡第一个走出来的大学生，为父母乡亲所骄傲所崇拜的才子黄家楣，在上海一直愤懑怀才不遇，大学毕业就失业，在这里，他有一个妻子，和一个不大的孩子，生活勉强过得下去，当父亲来探望时，发现自己的儿子挤在一个不过十平方米的房间里，顿时大失所望，也成为乡亲们的笑柄。老父亲自知自己留在这里碍事儿，提出离开，无意中发现父亲留下的一两块现洋，黄家楣悲痛至极，不禁潸然泪下，他极力的想让父亲相信他过得很好，可是不随人愿，现实就像一把锋利的刀片，退去伪装在外表的华丽和虚荣，让你乖乖的露出本来面目。每个人都变成了生活的奴隶，现实的残酷已经把这里的所有人折磨的力不从心，越是想掩饰什么越暴露无疑。